

八十自述 (下)

錢大鈞

江西剿匪兩廣事變

回憶主持武漢分校三載期間，適值江西共匪日漸猖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親臨南昌督剿，余一度奉召為行營辦公廳主任，嗣因日本侵略華北日亟，(二十二年長城之役)張學良督戰無功，下野出國，何應欽代北平分會委員長。余隨 蔣公北上，任保定行營主任兼北平軍分會委員，並奉命成立保定編練處，余兼主任。該處先後編練六個團，除以三團就近補充華北作戰部隊外，其餘三團開至江西編為獨立旅，以王耀武任旅長；厥後共匪由贛西竄，大軍追剿，該旅亦為追擊部隊勁旅之一。

二十三年保定編練處結束，余奉命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參謀長，委員長自兼總司令；副總司令李濟琛未到差，余以參謀長代行職權。是時，委員長特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方針，故軍政配合緊密，剿匪日進有功，并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而以發揚民族精神，革新人民生活為天下倡。

旋張學良返國，繼任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余

請辭未准。張既調東北軍至，大權獨攬，余處此環境，惟有一本忠誠，為國服務，故能相安。迨江西剿匪成功，三省剿總於二十四年初撤銷，張調武昌行營主任，余仍任行營參謀長。

二十四年冬武昌行營結束，另在西安設西北剿匪總部，公命張學良以副司令兼代總司令，使負責清剿陝北殘匪之責，余則奉調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兼侍衛長，余隨 委員長年久，相知既深，信任亦專，凡細務不須上聞者，余皆隨時妥慎處理，不稍擱置，俾以分擔領袖宵旰之勞，不使萬幾叢脞於一身，而得以專心壹志於重大國策也。事有重要機密者，多親自研處，隨時請示，雖日以夜繼，不敢辭勞。在侍從室數年，凡內外上下之情，必妥為協調宣釋，幸無隔閡與貽誤。

二十五年六月兩廣發生事變，廣州綏靖主任陳濟棠等以抗日為號召，發出通電，將有所行動。幸陳部第一軍軍長余漢謀方駐軍贛州剿匪，尚未回防，聞訊大為不滿，以為外侮方亟，未可更有內爭，隱然不直陳之所為。余與漢謀為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及保定軍官學校同學，並曾共事於粵軍第一師；委員長因命余邀余氏入京，漢謀果

坦誠應召。繼之，廣東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亦有電責陳；深部空軍亦深明大義，歸向中央。陳以所部離心，知不可為，乃悄然下野，所部交漢謀統率，余奉命先入粵部署一切，過韶關與漢謀晤商後，即與同機飛廣州，旋 委員長親臨廣州，派陳 誠、程 潛等入桂，對李宗仁、白崇禧動以大義，亦告妥協，旋李宗仁應 委員長電召由桂乘機飛抵粵垣，余銜命往迎，館舍既定，委員長即偕余往訪，晤談甚歡，誤會冰釋。至是所謂兩廣事變，不費一兵一彈，而告和平解決。翌年抗日戰起，白崇禧首先入京；兩粵雄師，亦絡繹東來作戰，是知 委員長於兩廣變起，即主和平解決，保全軍力實多，京滬陷敵以後，武漢能守至一年以上者，賴有此也。

西安事變身歷其險

兩廣大局平定，舉國慶幸統一，不料西北剿匪副司令張學良竟喪心病狂，發動西安事變，劫持領袖，陷國家於極度危險之境。

二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為 委員長五秩華誕，舉國人民，熱烈籌備慶祝。 委員長以外患

方殷，人民疾苦，不欲鋪張揚厲，先已進居洛陽。中間曾一度巡視西安、蘭州，於避壽外，亦為部署剿匪軍事也。誕日，山西閻錫山、陝西張學良、楊虎城等皆來洛祝嘏。十二月四日張學良復以事來洛請示，委員長與張同車往西安，駐節臨潼，不料一週後竟發生震驚中外之空前巨變。先是張學良以其父作霖於民國十七年由平出關時，途中遭日人暗算致死；其視為采邑之東三省，為日侵佔有年，國難家仇，時思報復，頗主與兵抗日。會共黨竄陝，勢窮力蹙，而委員長一本安內攘外之既定國策，準備進剿，消滅之期，已不在遠。共黨惶懼，遂利用張學良之復仇心理，

百端挑撥，張受其愚；適楊虎城（陝西綏靖主任）部駐西安，左右多共產黨人，張、楊與共黨乃互為勾結，陰謀聯合各方力量，藉抗日為名，企圖進而傾覆中央，別組政府，遂乘委員長來陝召集剿匪會議之際，於十二月十二日發動西安事變，企圖劫持領袖，號令天下。彼等初擬於九日發動，以委員長方召集會議，中央將領將聯袂蒞陝，為一網打盡計，故延緩至十二日實施。

時陳誠、蔣鼎文、衛立煌諸將領，皆奉召共商西北剿匪軍事，其部隊亦將陸續開陝，乃陳等方到齊而變作矣。是（十二）日天方曙，張命劉多荃、白鳳翔率其騎兵來臨潼，劫持委員長。楊部則負責封鎖西安，劉、白騎兵行抵半途，與我憲兵接觸，至臨潼附近，侍衛官及衛士一連，憲兵一連立與作戰，余聞警起床，槍聲漸密，逆軍已行近華清池，急馳赴委員長住所，方登臺階

，槍彈密集不得入，據衛士報告，委員長已越牆登山，余反身欲往第二組宿舍，宿舍已被包圍，逆軍見有人至，開槍迎擊，余折回避之，甫升階而中彈，由背穿右肩出，伏地呼侍者，侍者陳坦至。又聞呼「開槍」之聲，坦降階偵之，被拘。余負傷仍指揮衛士作戰，上午八、九時間，逆軍節節逼近，憲兵已潰，衛士人少，非死傷即被俘。余行至華清池畔，遇白鳳翔斥之，白謂：「城內楊虎城兵變，副司令（指張）令我前來保護委員長，其速請委員長出。」又曰：「現在兩院有憲兵抵抗，君下令停止，則君可無事。」答以：「我不能命令憲兵。」俄頃，白選士兵四人，各賞百金，命領余往西院，覓委員長，余不行。兵作開槍狀，余大聲叱之，并曰：「即擊斃我亦不行。」相持有間，彼等即劫余至門口車間，有一持木壳槍者監守。半小時後，一砲兵上校來請余登車，問何往？則曰：「副司令請去。」入城至新城大樓，被押於楊虎城之衛隊室，時上午十時餘矣。俄而邵力子亦被監者領至，見余受傷，為之歎息。忽張學良來，揖余等道歉。邵語以：「慕尹負傷，蓋為延醫。」張唯唯，以電話召醫，即離去。余時流血雖久，精神尚佳，與邵談，始知逆軍已成立抗日臨時軍事委員會，通電發表主張，徵各方響應。近十一時，張又來，謂

委員長已尋到，未負傷，即可入城。言畢，復匆匆去，其緊張慌亂之狀，至可鄙笑。張去後，何柱國（騎兵軍軍長）至，柱國為余同學，情誼甚篤，相對唏噓，急往取雲南白藥及衣服，並為

延醫。十一時先服白藥少許，迨醫來，衣為血黏不得脫，剪去始敷藥包裹換衣，施手術畢，竟臥床不能動。至是流血已六小時，醫言，如傷口不發炎，不致有危險云。

傍晚，柱國來，請移居其家，謂先已得張許可。余謝之曰：「居君家使君被嫌，且西京招待所諸公同被俘，獨余受優遇，皆不可。」旋張至，余責張曰：「委員長遇君甚厚，今竟出此，為天下後世唾罵，君將何以善其後。」張不能答，但強余遷柱國家。既移居柱國家，為召陳坦隨侍，款待週摯，惟受監視甚嚴；有時柱國入余室，亦必有張之副官俱來。王以哲（一〇五軍軍長），東北人，張之嫡系，曾肄業保定軍校八期，余之弟子也。來視余，竟亦有人監視，僅坐少頃，道老面好而離去，他無一言。某日，柱國告余，宋子文至。又一日，謂蔣鼎文飛南京。至二十四日，又謂蔣夫人至。其內幕為何？皆無所知。二十五日下午四時，有飛機數架，飛過余屋，傍晚柱國回，則知委員長飛洛陽，張學良隨往。張自言：「吾敢賭頭顱以劫持委員長，亦敢賭頭顱以伴送委員長回京。」柱國又謂：「明日可恢復自由，候委員長抵京，被羈之人皆可離去云。」

二十六日楊虎城來，自道慚愧；自余被俘，此為楊首次來晤。楊去後，余偕柱國訪問同難諸公於收容所，彼此皆以事變解決，委員長出險，莫不喜出望外。是時，余創處尚未收口，兩星期中，每日以紅藥水洗之，幸未發炎，內部無傷

，只彈穿鼻尖，已收縮復原，故可行動。當事變發生時，逆軍至西京招待所，同時被俘者邵力子外，有陳調元、蔣方震、蔣作賓、蔣鼎文、陳誠、朱紹良、衛立煌、陳繼承、萬耀煌諸人，獨邵元冲越窗時中彈死，是可哀矣。我警衛組長蔣孝先、衛士隊長毛裕禮均拒敵陣亡，另有衛士多人負傷，秘書蕭乃華亦不幸中彈殉職。是晚，在新城大樓楊虎城宴客席上，知 委員長本日安抵首都，余等亦獲於二十七日飛離西安，下午到京。

聞 委員長到時，群眾夾道歡迎，萬人空巷，爆竹聲不絕於耳。以一身繫國家安危，如 委員長者，雖編氓亦知愛戴，何張學良不加慎思，狂妄一至於此！而日暮途窮之共黨，則藉此事變，得以苟延。其後，抗日戰起，共軍第八路軍在華北一帶，新四軍在長江下游，日形坐大，處處牽制國軍，妨害戰局。泊抗戰勝利，裹脅益衆，爲禍益烈，而張學良故鄉東北三省糜爛尤甚！及今思之，此一事變之加害於國家，豈張學良百身所能贖耶？

從侍從室到航委會

余自西安事變受傷，赴滬休養，二十六年二月奉命回到侍從室。是時我全國軍民於陝變平定後，愛戴 領袖與團結禦侮之熱誠，益爲顯著，而中、日局勢則日趨緊張。是年七月七日，日軍發動侵華戰爭，進攻盧溝橋。委員長適在牯嶺，主持暑期訓練，并邀請全國各界俊彥，共商國是，據報當即決策準備全面抗戰，但一面與敵周

旋，一面仍由外交途徑爭取國際之同情與支援。當時外交部緊要公文，多以電話請示，余不敢假手他人，每親自錄稿呈閱，而有關軍機文電，尤紛至沓來，應接不暇。自余主持侍從室以來，工作繁重，未有逾於此者。嗣隨節回京，值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軍隊之部署調遣，戰事之指揮計劃，敵情之判斷，戰訊之搜集，其須請示或報告 委員長者，又皆經過侍從室，余之處理，益無暇晷。又隨時扈從 委員長赴蘇赴滬赴松，巡視防務與戰況，中間并曾二度銜命赴前線犒軍。皆於飛機掃射、砲彈密集中往還也。

十一月，淞滬戰事既達消耗敵軍目的，軍隊後撤，蘇州至福山一線守軍，相繼轉移，政府決定遷都重慶。當此局勢緊張之時，留置首都倉庫之故宮古物七千餘箱猶未疏運，而政府有關部門員工，均已疏散西上，運輸工具亦極爲缺乏。張岳軍先生有鑒於古物之珍貴，特向委員長 蔣公建議謂「故宮博物院之古物七千餘箱，留在倉庫尙未運出，目前下關尙有船隻可供運送，惟市內車輛缺乏，可否命錢主任大鈞負責調用軍車將其運送至下關，裝船疏運，以免珍貴古物淪入敵手。」 委員長當即核准，并命余執行，余即與後勤單位協調，於軍運繁忙中勉爲調集車輛十餘部，由余親自監督，於二十四小時內將庫存國寶搶運下關裝船西遷。由於 委員長之英明果決，我中華文化之精英賴以保存。十二月五日敵逼近湯山，余於七日隨侍離京，直飛星子。南京於十二日失陷。

十二月十四日， 委員長蒞武漢駐節，即在此計劃持久抗戰，同時整補部隊，調整機構。軍委會所屬各部會皆移駐武漢，號令一新，長期抗戰之基礎於以奠定。

二十七年二月， 委員長下令改組航空委員會，以宋子文、孔祥熙、何應欽、白崇禧、陳誠、賀耀祖、徐永昌、蔣宋美齡及余與周至柔爲委員， 蔣公自兼委員長，而任余爲該會主任，負空軍實際責任。航委會設軍令、技術、總務、防空四廳，任毛邦初、黃光銳、黃秉衡、黃鎮球爲廳長；蔣堅忍爲政治部主任。另設第一軍區司令部於蘭州，以沈德燮爲司令；并設空軍第一、第二、第三三個路司令部，任張廷孟、劉秀秀、田曦爲司令，協同前線陸軍之作戰。本會爲造就飛行、機械、防空等項人才，先後設立空軍軍官學校（昆明），任周至柔爲教育長；空軍機械學校（成都），任錢昌祚爲教育長；防空學校（貴陽），任黃鎮球兼教育長；另創空軍軍士學校（成都），任晏玉琮爲教育長。至空軍各學校校長，均請由 委員長兼任。

是年三月廿九日，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臨時代表大會集會於武昌，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修改本黨總章，設總裁以代行總理職權；推選 委員長爲總裁，以領導全民抗戰。又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統一青年運動，裨助抗戰。

四月廿九日爲倭皇誕辰，日人稱爲天長節，余料敵必於是日大舉轟炸武漢，即預令調飛機戒備。是日下午一時，果據情報，敵轟炸機四十餘架

，大編隊來襲，當令我機準備升空應戰。二時許，敵機越英山西飛至涪水，三時左右，侵入武漢上空，我正嚴陣以待，經半小時之激戰，敵機被擊落二十一架，我損失及失踪九架。是役也，敵出動轟炸機、驅逐機合計五十餘架，我升空驅逐機八十餘架，雙方共出動飛機達百三十餘架之多，實抗戰以來最大規模之空戰也。

五月初我以振奮全國軍民之士氣與信心，提高國際聲譽，並震撼敵軍閥之黷武情緒，打擊敵政府之威信為目的，奉 委員長核准，派機對敵國本土襲擊。但我為顧全人道。不欲使敵國無辜人民遭受損害，故不用炸彈，而代以特具反暴意義之傳單。經積極籌畫并着手人員、油料及起落機場之準備，至五月十九日準備就緒，且偵知東方氣候良好，乃派技術優良又富有飛行經驗之第十四隊隊長徐煥昇上尉率機兩架於是日下午三時由漢口起飛，下午五時五十分到達寧波機場，加油檢查後，於下午十一時四十八分趁月光明亮時出發。徐君臨行時曾來電話表示其履行此項任務之光榮與決心。余當至勗勉，祝其成功。五月二十日上午三時我機到達日本之長崎、福岡，久留未等地上空，盤旋約三十分鐘，散發傳單後，並偵察其軍港及機場之情況，於上午十一時完成壯舉，飛回漢口。我行政院孔院長祥熙、各部部长及各報記者均到達機場歡迎，咸對此次空襲之成功，表示欣讚。日本自詡為現代國家，情報準確，而對我之空襲，竟未預先發覺，其防空之疏忽，亦可知也。

同年四月，臺兒莊大捷後不久徐州失陷，安慶、九江相繼棄守。敵乃集中兵力，進行武漢攻掠戰，我軍節節抵抗，逐次後撤，至十月中旬，敵軍迫近武漢，中央決定即西遷重慶。二十四日敵逼孝感，是夜，委員長飛衡陽，余則於翌晨飛離漢口。余到衡陽時，侍從室主任林 蔚，以協助武漢警備司令郭 懌，未能隨節西行，委員長命余暫行兼理侍從室任務。

抗戰初期，上海、南京、武漢相繼撤守，政府一再播遷，一般意志薄弱份子，不免因之氣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汪逆精衛由渝潛行飛昆，轉越赴港，竟於二十九日發出豔電，響應敵相近衛宣言，公然附敵叛國，不惜遺羞萬世。翌（二十八）年一月一日日本黨中常會決議，開除汪逆黨籍，并發布告國民書，昭示政府長期抗戰之決心。

武漢撤退時，航空委員會決議遷成都，重要器材先由水路運往，人員則暫移衡陽。為利於偵察敵情，經密組情報電臺，留駐漢口，凡敵機之起飛降落，敵陸軍之行動及其方向，皆隨時向本會報告。直至三十一年宜昌陷落以前，迄未被敵破壞，該臺人員之機警忠勇，至足嘉尚，是可紀也。

軍委會軍政部工作

三十年七月，余奉命任軍委會運輸統制局參謀長，本局成立於二十九年，負統一運輸管制及運輸檢查之責。局設秘書、監察、財務三處；運

輸、工程、機械三總管理處，及液體、管訓、配件三委員會。主任係由參謀總長何應欽兼任，副主任由交通部長張嘉璈、後勤部長俞飛鵬兼任。自余入局，始有專任負責之人，業務自較易於推進；國外物資之輸入，國內物資之轉運，漸能依照計劃實施。公路水運之修繕疏通，軍船之置備運用，亦日有改進。是年十二月，余為瞭解國外業務狀況。曾至仰光實地考察，并監督物資之搶運，回渝後，依據實際運輸情形，詳析利弊，報請改善。嗣局改為文官編制，幕僚長易稱秘書長，仍由余擔任。

是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空軍突襲珍珠港，并大舉南進，與美國為敵；至是，我國遂一變五年來單獨抗戰之孤危形勢而與美、英兩國併肩作戰，委員長且被推舉為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三十一年，奉令任軍政部政務次長，部長何應欽，余與之共事最久，常次張定璠亦為昔年黃埔軍校同僚，相處至感愉快。是時，軍政部負全國三軍兵員、武器、裝備、糧秣、經費供應之責，業務非常繁重，而部長兼參謀總長，不常到部，重要業務，隨時請示裁決；一般業務，悉由余與張君負責處理；余主管軍需署、兵工署、軍務司、會計處、軍糧總局、總務廳等單位業務；張君主管軍醫署、兵役署、軍法司、交通司、馬政司、機械化司等單位業務，數年之間，綢繆因應，不敢稍懈，幸無貽誤。

余自任軍政部政次，同時兼任本部點驗委員

會主任，主管全國部隊人員、馬匹、武器、裝具及訓練保養之點驗事宜，由軍委會所屬各部會派員參加，派遣小組分駐戰區，適時點驗。賴上下戮力，不避嫌疑，嚴格執行，隨時提供詳實資料，使統帥部對全國部隊有形無形戰力，瞭如指掌，用能適切命使，克達預期功效。

三十三年冬，中央為統一作戰指揮，仿美國制度，設陸軍總司令部，以參謀總長何應欽兼任總司令。何辭軍政部長，以陳誠繼任。余與林蔚對調，再度入侍從室。時侍從室分設三處。第一處主軍務，第二處主政務，第三處主人事，余以第一處主任兼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局長，（副局長為戴笠），於十二月一日到職，二、三兩處，則由陳布雷、陳果夫分任之；侍衛長由俞濟時專任。一、二兩處共設六個組，第一組組長陳希曾，第二組組長趙桂森，第三組組長黎鐵漢，第四組組長陳方，第五組組長陶希聖，第六組組長唐縱，連余均在重慶德安里 委員長官邸辦公。第三處設四個組，在重慶南溫泉辦公。

十二月四日，敵越桂林、金城江，經獨山、都勻，指向貴陽進攻，陪都震動。何總司令急馳赴黔省部署，轉昆明就職。時有主張遷都者，委員長力持鎮靜，不予置議；調重兵於遵義附近，欲引敵深入，以箝形攻勢殲滅之。乃敵佔都勻後，攻勢頓挫，另向芷江方面作猛烈之進攻，第四方面軍堅強抵抗，固守芷江不為動，敵以死傷重大，卒引退。後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將軍及其參謀人員，曾往戰地視察，對我軍大加讚譽；是為

抗日戰爭中最後而最關重要之一役也。

余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再任 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迄三十四年八月止，在此期間，中美軍事協調工作頻仍，每週舉行會議一次，由余與駐華美軍總司令兼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將軍共同主持，如有必須請示事項，均由余呈報 委員長裁示，或由余陪同魏德邁將軍晉謁 委員長當面請示。余與魏德邁將軍亦因長期交往，所以建立深厚友誼。

三十四年七月，美國以新武器原子彈轟炸日本之廣島與長崎，蘇聯亦投機對日宣戰。敵經我八年抗戰。佔地雖廣，而牽制敵軍兵力甚大。此時，美軍在太平洋上已佔絕對優勢，敵海空軍損失殆盡，陸軍亦多孤立於各島。自知大勢已去，遂於八月十四日宣告投降，陪都得訊，立即傳播全國，渝市民眾熱烈慶祝，歡呼聲與爆竹聲徹夜不絕。

抗日之戰，動員之衆，歷時之久，在我國曠古所未有。賴 領袖蔣公，於國勢岌岌，群情惶惑之際，獨能堅定心力，內整勁旅，外結強援；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終於打倒強敵，成就不朽偉業，而致中國於四強之林。余在抗戰開始及勝利結束之時，適皆侍從 委員長，欣沐餘光，親見 委員長履險如夷，當機立斷，以不變應萬變之偉大精神，能不令人致其惓惓之誠耶！

勝利後出長上海市

抗戰勝利後，余奉命出任上海市長，兼淞滬

警備總司令；九月八日派首批人員赴滬，余於次日偕同美國空軍總司令斯特拉梅耶將軍同機飛滬，於下午二時抵大場機場，在機場歡迎民眾，不可數計。余登汽車經江灣轉四川路、南京路、西藏路、霞飛路至愛棠路，出席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之歡迎會，沿途民眾懸旗燃爆竹，貼標語，呼口號，熱烈歡迎，是可知子遺之民，在敵偽佔據時期，創鉅痛深，其望凱旋，有如望歲，余自思德鮮能薄，膺茲鉅任，將何以副此數百萬市民嗶嗶之望？則於引為榮幸之外，又不勝其戒慎恐懼之情也。

接事不久，蔣公蒞滬巡視，滬市民眾，歡欣若狂，擁擠於街頭巷尾之人群，爭睹 公之豐采，間有喜極落淚者，充分流露其愛戴 領袖之熱誠，余忝為地方首長，逢茲盛況，不僅深感榮幸，亦為一生所不能忘者。

滬市地廣人衆，為東方第一商埠，自不平等條約廢除後，各國租界悉重入版圖，轄地益廣，勝利復員後，內地人民遷來市區者日衆，而道路溝渠，久失修繕；公用事業殘破不堪！工廠以缺乏原料與動力，多數停頓；教育設施及衛生機構，尤不完備，凡市民之所需，類皆供不應求。而稅收一時未上軌道，僑幣充斥；金融財政與社會秩序，急待整頓。余身兼國際觀瞻所繫大都市之市政保安兩項重任，惟有殫精竭慮，督同各主管人員，戮力以赴，共濟時艱。滬市為全國院轄市中之最大者，市政既繁，市政組織，亦較龐大；當時各局人選社會局長為吳開先，財政局長為浦

拯東，工務局長為趙祖康，教育局長為顧毓琇，公用局長為趙會珪，市府秘書長為沈士華，會計長為閔湘帆，市銀行總經理為周芳，皆一時之俊彥，多能匪勉稱職。至滬瀋警備總部一般業務，責成副總司令李及蘭全權處理，重要公務則由余親自裁決。

余接任市長後，除致力整飭各項市政外，并遵中央命令，成立上海市臨時參議會，經選出徐寄廬為議長，積極推行地方自治工作。余為適應未來情勢之需，特擬具「大上海建設計劃」，草案初定，視人力財力逐步推進。惟滬市承戰亂之後，值艱難之會，業務紛繁，諸待策進，實非才疏如余者所克勝此重任，爰思退避賢路，免滋貽誤！三十五年三月，辭兼滬瀋警備總司令；五月，辭去上海市市長，同月二十一日交替，繼任者為吳國楨先生。

余既交卸上海市市長，暫息影蘇州故里，三十六年四月，當選吳縣參議員，旋當選議長。同月，中國國民黨舉行第六屆第三次全體執行委員會，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

共禍蔓延受命入川

抗戰勝利，政府正致力於復員工作，詎料中共匪幫既於戰時乘危坐大，復於戰後瘡痍未復，民困待蘇之際，利用俄國援助，積極部署叛亂，使匪眾紛由陝北、華北、華中各根據地出動，竊擾地方，裹脅民眾，到處破壞交通，阻撓政府復員與受降。迨至三十五年夏，匪更擴大叛亂，大

局由是日趨惡化！

三十七年多，徐蚌會戰，國軍失利，匪勢益張！戰禍漸由華中各省向西蔓延，西南各省震動。是時，余蟄居梓里，目擊時艱，不禁撫髀興歎！適中樞以西南形勢重要，必須妥籌防衛，藉以鞏固後方，進圖扭轉危局，於是屬余出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職務，余以份屬軍人，且為國民黨員；臨危受命，義不容辭，乃不計成敗利鈍，毅然應命，於三十八年一月經廣州前往重慶。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係由重慶綏靖公署改組，轄四川、貴州、雲南、西康、重慶等五個省市，公署組織及主要官員列左：

- 長官 張 群
- 副長官 錢大鈞(專任) 楊 森(兼任)
- 參謀長 鄧錫侯(兼任) 劉文輝(兼任)
- 參謀長 蕭毅肅 副參謀長 劉宗寬
- 秘書長 徐思平 辦公廳主任 周君亮(後升秘書長)
- 第一處處長 董 俊 第二處處長 徐遠舉
- 第三處處長 劉宗寬(兼) 第四處處長 袁進機
- 總務處處長 劉 璜 政工處處長 張元良
- 監察處處長 王從龍 軍法處處長 王問佛

此外，為求政、軍密切配合，策進各省政經設施，暨統一反共部署，特設立政務委員會，由張長官兼任主任委員，轄區各省市軍政首長兼任委員，并以張篤倫為秘書長，萬子霖為秘書處長

兼文教處長，沈鵬為政務處長，劉覺民為經濟處長，周開慶為土地處長。

公署在成立初期，所轄正規部隊及地方保安部隊，全部兵力共約二十五萬人。正規部隊中除駐昆明之余程萬軍及駐重慶近郊之羅廣文部，尙稱完整可以使用外，至劉文輝之第二十四軍，鄧錫侯之第九十五軍，均係素質較差之川軍，不但訓練不精，且乏為反共而奮鬥之意志與精神，故西南防務，實質上至為空虛！

中央為充實大西南軍力，曾明令川、滇、黔三省組織民間武力，成立八個軍；西南軍政公署遵照中央建軍方案，除加強軍政各方措施外，并設立專案小組，負責各軍整補及建軍事宜，由余親自主持。

三十八年三四月間，國軍於華中各省經激烈戰鬥後，多殘破不堪，奉命紛紛入川整補，使長官公署負荷倍增，籌張因應，頗費周章。是年七月間，共匪竄佔蘭州，西北局勢逆轉，駐在陝西之胡宗南部各軍，處境陷於孤危；同時宋希濂部，在湘、鄂作戰失利，中央乃命胡、宋兩部撤入川境。未幾，匪軍壓力日增，川黔局勢，日趨緊張，中央政府於十月間遷來重慶，而代總統李宗仁於十一月間，來渝後，正當匪軍侵入川境之際，放棄職守，經滇出國！中樞無主，人心惶惶，一部川人及地方將領，愚昧無知，受共匪惡意挑撥，意志動搖，頗有妄主「川人治川」，冀恢復昔日軍閥時代之防區制度者，值此風雨飄搖之秋，蔣公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不顧艱危，特由

台灣飛蒞重慶，企圖協助政府挽救危局，終以局勢垂危，雲南主席盧漢，亦告不穩！重慶終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余隨侍總裁，於是日晨始離渝飛蓉。政府決定遷往台灣，再圖規復。余於十二月間乘政府專機，自成都飛往海南島，勾留數日，轉來台灣。

余抵台後，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利用閒暇，協助體育界，倡導各種體育運動，之後，曾數度率領田徑、足、籃球隊，前往東西各國，參加國際比賽。

余自北伐以後，至三十五年為止，先後奉頒北伐紀念勳章，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三等寶鼎勳章，晉授至一等；二等雲麾勳章，晉授至一等；一等景星勳章，一等空軍復興勳章，青天白日勳章，空軍河圖勳章，華青榮譽獎章，以及抗戰紀念章等。回顧八十年來，遭逢時艱，備歷世變，雖勉竭駑鈍，以赴任使，幸無隕越，然檢討過去，對國家，對領袖，貢獻均甚有限，迭邀懸賞，徒滋愧怍而已。

推進體育航空事業

余自幼愛好運動，尤喜足球；進入陸軍小學後，經常參加足球運動。嗣入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正式組織球隊，被選為隊長，擔任前鋒，馳騁於比賽場中，至感興奮。畢業後，升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未幾，轉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即無機會從事球運。其後，回國任事，戎務倥傯，亦無法作體育活動。民國十八年任中央陸軍軍官學

校武漢分校教育長，親自訓練第七第八兩期學生，環境利便，乃積極致力體育訓練，對籃球足球，尤為注意，曾開全校運動會數次。民國卅一年任軍政部特別黨部特派員，組織軍政部籃球隊，參加各種比賽，後在台灣最著名之七虎隊，即由軍政部籃球隊演變而成。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首任上海市市長，在此任內，提倡體育不遺餘力，曾組織市府職員隊與裁判隊，友賽足球，親自參加。其他足球籃球比賽，無不前往觀摩，以資策進。

民國三十九年來台，由台灣省體育會聘任為台灣省體育會足球協會主任委員，於是推行訓練，不斷努力。民國四十三年第二屆亞洲運動會在馬尼拉舉行，余被選為代表團足球隊領隊；比賽結果，榮獲冠軍，曾獲政府獎狀。

民國四十五年第一屆亞洲盃足球預賽，我與韓國足球隊在漢城比賽，當時聘定陳樹桓君為代表隊領隊，余任顧問，臨時陳君因故未去，乃改由余代理領隊，在漢城不幸以二比零失敗，余曾激勉球員：「誓雪漢城之耻」，詎知次賽在台北舉行，又以二比一而被淘汰。民國四十七年在東京舉行第三屆亞洲運動會，余以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義出席參加。本屆足球代表隊奮力擊敗韓國，榮獲冠軍，卒得滿雪前耻。同時，我籃球隊擊敗亞洲籃球王國之菲律賓隊，本可榮獲冠軍，但以計分方法不同，致屈居亞軍。

民國四十八年一月第三屆世界盃籃球賽舉行於智利，余被選為中華民國代表隊領隊，率隊前

往。在預賽之三場比賽中，以兩勝一負資格，晉入決賽。當時在國際籃球協會會議中，蘇俄代表提議，排斥我國，余據理駁斥，并獲得出席各國代表之支持，而使蘇俄受到精神上嚴重之打擊。比賽結果，我名列第五，而蘇俄與保加利亞因對我棄權，列為第六第七。

民國四十九年八月，第十七屆世界運動會舉行於羅馬，余被選為中華民國籃球隊領隊，率隊隨同中華民國代表團前往，先參加外賽，因到達時間太遲，球員長途跋涉，疲勞未復，即行出賽，致對西班牙隊及捷克隊兩度失利，未能進入決賽而遭淘汰，殊堪扼腕。同年十月十四日，第二屆亞洲盃足球決賽舉行於韓國漢城，我國已於去年取得決賽權，故派隊參加，由吳壽頤領隊，聘余為顧問。參加球隊，除我國外，為韓國、以色列與越南。我首戰以二比零勝越南。次戰以零比一敗於韓國，再戰又以零比一敗於以色列。因此，在第二屆亞洲盃足球決賽中，名列第三。此戰雖告失利，然分數極為接近，球員精神旺盛，球技亦頗為大眾所稱道，預料不斷努力，從事準備。當能於下屆為國爭光也。

余於民國四十六年出任私立復興劇校董事長，并膺選為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第一屆常務監事，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改選，余又當選為第二屆常務監事。是年會擔任第十七屆世界運動會中華全國代表團籃球隊領隊，遠征羅馬，并出任中華全國田徑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國五十年受聘擔任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顧問。民國五十三年，率領

田徑代表隊赴日參加第十八屆世運會，并擔任國際田徑會議代表。民國五十七年，曾率田徑隊赴墨西哥參加第十九屆世運會，并擔任國際田徑會議代表。民國五十九年，率領田徑代表隊赴泰國參加第六屆亞運會，并擔任田徑會議代表，民國六十一年率領田徑代表隊赴菲律賓參加國際田徑

對抗賽。六十二年出任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名譽會長。時余已屆杖朝之年，仍自覺猶未減當年馳騁疆場之雄心壯志也。

余於民二十七年曾出任航空委員會主任，任期內，曾派機遠征日本，執行心戰任務，圓滿達成。故對航空事業頗具經驗，來台後於五十二年

六月十日就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乃全力發展我國民航空運事業，五十五年一月二十日，向美採購波音七二七型噴射客機五架，創我國民航空運進入噴射機時代之先鋒。迄五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榮升中華航空公司名譽董事長，私心竊引為榮

民國三十四年本文作者(左)與今總統蔣經國先生(右)何應欽上將(中)合影。

二十七年作者(左)陪孔祥熙(中)何應欽(右)歡迎遠征日本空軍英雄徐煥昇等。

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本文作者(左)與田徑女傑紀政(右)合影。

